

# 高砂義勇隊精神 應千古流芳

高砂義勇隊精神 千古に芳しきを流へるべき  
The Spirit of the Takasago Volunteers Should Be Passed Down Forever

張昌義

閱讀貴刊第九期〈高砂義勇隊紀念學術研討會〉報導，讓我油然憶起六十多年前，畢生難忘的往事。文中雖有提及六篇論文，但因內容不得而知，故以個人記憶所及，概述感想如下，做為原教界之參考。

日據時代，對原住民的行政管轄與平地人是有所區隔的，在理蕃政策下由警察機關管轄之，修業年限四年的「蕃童教育所」，是唯一教育原住民孩童的學堂，其教育水準當然比不上平地人的「公學校」。小學生們經過四年的教育所畢業後，除了少數成績優秀者，被送至平地人的公學校，或日人就讀的小學校繼續進修外，其餘畢業生被編入「青年團」（分男、女）接受定期性軍國主義國民教育訓練。其主要教育目標就是所謂「皇民化」教育。有國家才有家鄉，有家鄉才有家庭，我們的安居樂業是國家賜給我們的，我相信這些觀念是正確的，而且我們從小就被徹底灌注這些信念，當時台灣在日本統治下，我們的國家認同只有日本是我們的國家。所以當時我們這一輩的人都被養成充滿忠君愛國精神的國民。

1943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當時台灣還沒有實施台灣人的徵兵制，所以對原住民仍以「高砂義勇隊」名義徵召年輕人送至戰場。在我的家鄉裡，我所知道的範圍內，並非強制性徵召隊員，是以志願應徵的（我想其他地區的原住民也是一樣吧！）因為當時的年輕人自從中、日戰爭以來不斷地接受軍國主義思想訓練，被養成犧牲自己生命來報效國家是無上的光榮精神。除了義勇隊員外，還有「捕虜（俘虜）監視員」也是志願從軍的。他們出發從軍時，都會受到鄉親們「恭喜」的祝詞，而各機關學校的成員、學生以及鄉親們，都不辭辛勞的徒步七、八公里遠的山路，一路送到南庄車站

## 張昌義 小檔案

賽夏族。1923年生。開南商業學校畢業。曾任第一屆南庄鄉鄉民代表。南庄礦業公司副總經理退休。父親張慶昌、母親張富美，均曾任苗栗縣議員，是賽夏族政治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熱情的揮舞旗幟、唱歡送歌來歡送他們。我想被歡送的隊員們心裡一定感覺到無上的光榮，但畢竟赴戰場要有死在沙場上的決心，我想他們應該也抱著悲壯的心情離開故鄉的吧！（從我們家鄉出征的義勇隊員共有4人，只有1人生還。）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的戰敗，台灣光復中華民國的懷抱，時世的變遷讓台灣由戰敗國變成戰勝國，但我們對於二次大戰犧牲者究竟如何來看待呢？難道以戰勝國的立場來看他們，是為日本賣命的賣台份子？如果是這樣的認定，我認為太不公平了。他們應該是為了捍衛家鄉，被時代犧牲的烈士。烏來的紀念牌是紀念他們的精忠報國、保衛家鄉的崇高精神而已，我認為不應該以國家的改變而抹煞他們的精神來拆除紀念碑。

其實我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策感到非常不滿，當時在台灣的族類稱呼分別是，來台的日人叫「內地人」；台灣平地人叫「本島人」；山地人叫「蕃人」以此來區別。內地人當然擁有各種的特權，例如本島人子弟在中等以上學校的就學率不到內地人子弟的百分之十（台灣人子弟對中等以上學校的進學率是被限制的）。我當時在商業學校畢業

後就職於「台灣電力會社新竹支店」（現在的台灣電力公司之前身），跟我一起進入公司同等學歷的內地人與我的核薪就有8元的待遇差別（內地人月薪50元、本島人與蕃人是月薪42元）。我雖然內心充滿了反殖民差別待遇，但不可思議的內心燃起「捍衛國家，匹夫有責」的精神，仍於二次大戰初期在沒有取得父母的同意下（我是獨生子），報考台灣軍司令部所招募戰地軍屬後被錄取從軍（當時被錄取的軍屬包含內地人約50人）。我被正式錄取從軍後，向父母報告，父母親很驚訝，但沒有責罵我。當我要離開故鄉時，鄉親們照樣熱情的歡送我，而且當我要搭深夜12點的夜快車赴南洋時，台灣電力公司新竹支店店長以下全體同仁都到車站來歡送我，讓我深深感動，同時心裡有著可能無法再度踏上祖國國土的那種悲壯心情（我想義勇隊員們也是一樣的心情吧）。這種心情，除非實際經驗者，不然是很難理解的。話說回來，現今台灣的教育情況，讓我懷疑現在的年輕人有多少人有正確的國家認同？他們去當兵時有捍衛國家的榮譽感嗎？未來的台灣社會將變成怎樣的社會？實在令人擔憂。高砂義勇隊員為國陣亡的精神，讓它千古流芳又有何妨？